秋染秦岭

柯娟

单位坐落于县城西北方向大青山的山脚下，与那片广袤无垠的秦岭林地相距不过200米。办公之余，不经意间抬头，便能瞧见山色随着时光悄然流转。凉风轻拂过山脊，林间的绿意渐渐褪去青涩的模样，时光——这位神奇的织匠，徐徐展开一幅绚丽无比的巨大织锦——秋天，就这样静谧而又自然地呈现在我们眼前。

由于山峦的阻隔，每天上午十一点，秋日的阳光才缓缓斜斜地爬上山脊，与我们相逢。错过了清晨那带着丝丝寒气的阳光，此时的阳光显得格外温暖。我静静地坐在窗前，凝视着秋叶，这近在咫尺的秋色，宛如一种无声却又极具吸引力的召唤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便决定：这个秋天，我一定要走进这片山林。终于，在一个周末，我与家人一同踏入了这片山林。

秦岭的秋是如此公平，秋色均匀地播撒在每一处角落。随便走进一座山，都能让人感到身心愉悦。我们选择了县城背面的秀萍山，这里更契合孩子们的兴趣。

车子尚未停稳，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冲进了山里。迎面扑来的，是一个如燃烧般热烈的秋天：深红似血，橙黄如火。极目远眺，整座山仿佛被点燃了一般，层层叠叠的红叶在阳光的照耀下跳跃、闪烁，那

秋景如画　　翁桂涛/摄

绚烂的美让人不禁心生感动，甚至想要落泪。它们并非仅为追求一时的绚烂而存在，在秋阳的轻抚下，每一片叶子都散发着一种近乎倔强的光泽——明明知晓繁华即将落幕，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以最为饱满的姿态告别枝头。踩在厚厚的落叶上，沙沙的声音不绝于耳，那是生命在谢幕前的轻声低语，也是大地张开温柔怀抱接纳万物的深情回应。这般景象，不禁让人联想到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的身影，他们虽不张扬，却凭借着日复一日的坚韧，撑起了岁月的厚重与深沉。

穿行林间，金黄的银杏树构成了另一道迷人的风景线。它们或独自挺立，或成排而立，叶片恰似一把把精致的小扇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发出簌簌的声响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无数黄叶飘旋而下，宛如一场静谧而又浪漫的雨。孩子们兴奋不已，欢快地追逐着那一片片飘落的叶子，清脆的笑声在林间回荡。一位老人曾告诉我，他们村里的古银杏已有数百年的树龄，“叶子落了，不是结束，而是给树根盖上温暖的被子，这样来年才有力气长出新芽。”这看似朴素的话语中，蕴含着最为深刻的生态智慧——凋零与新生，本就是同一首歌谣的不同乐章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

山径旁，野菊花正开得热闹非凡。细小的花朵簇拥在石缝间、土坡上，它们不挑剔生长的环境，也不惧怕寒露的侵袭，只是用一抹抹明亮的黄色，点亮山野的每一个角落。它们无需用宏大的叙事来彰显自己的存在，只是安静而又专注地履行着生命的职责，将淡淡的清香融入空气。或许，基层工作就如同这些野菊一般，虽然并不耀眼夺目，却是让这片土地充满生机与活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继续深入山腹，几处依山而建的村落映入眼帘。走累了，我们随意选择了一条小路，拐进山腰中的一户人家。青石板路蜿蜒向上，木屋错落有致地分布着，门前的柿子树上结了累累硕果，几只麻雀正在树梢上吃得津津有味。一位老奶奶坐在门口悠闲地晒着太阳，怀里抱着一篮刚摘下来的柿子，熟练地做着柿饼。她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，招呼我们：“来尝尝，今年的柿子甜得很！”孩子们立刻被老人手上那削柿子皮的工具吸引住了，纷纷挤在老奶奶身边，跃跃欲试。青瓦木屋，石阶蜿蜒曲折，屋顶上晾晒着金黄的玉米和火红的辣椒，空气中弥漫着柴火饭的香气。老人告诉我们，她的丈夫正带着儿子一家播种小麦呢。正说着，年轻的女主人端出一碗热腾腾的洋芋搅团，热情地邀请我们品尝。那混合着辣酱与蒜香的独特滋味，是土地最直接、最慷慨的馈赠，也是人情最本真、最温暖的温度。

站在山腰回首眺望，层林尽染，云卷云舒。此刻的秦岭，如同一面镜子，清晰地映照出自然的伟大与和谐，也深刻地映照出人类应有的谦卑与敬畏之情。在这里，时间仿佛放慢了匆匆的脚步，让人得以从日常的忙碌奔波中暂时抽离出来，重新审视生活与工作的意义。

守护这片美丽的山水，不仅仅在于保护风景，更关乎我们能否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份宁静与丰饶。每一次走进山林，都是一次心灵的校准与洗礼。当城市的喧嚣逐渐远去，唯有山风与落叶的声音清晰可闻之时，我们才能真正倾听到内心深处的声音，找回那份对自然、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责任。

秋日的秦岭，值得我们用心去走一走。因为它时刻提醒着我们，无论身处何种位置，都不应忘记仰望星空，俯察大地。

（作者单位：陕西省镇安县人民检察院）

非虚构作品展

一张“假”照片

马士江

你相信吗？英烈杨宏明的遗照是“假”的！

第一次听说这事，是两年前的清明。我在贺伍庄村南北大街闲逛，82岁的王大爷见我从陵园走来，不经意间透露出这个惊人消息。

杨宏明是八路军著名抗日将领，曾任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。1942年4月29日，在反日寇“扫荡”战斗中，他牺牲在河北省临西县姚尔庄村东的麦田里。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。

英烈遗照怎么会是假的？又为何会有“假照”之说？闻听此事，我既惊诧又震撼。再三追问王大爷，可他只嗫嚅重复：“俺只听别人说过一嘴。”至于别人是谁，何时何地所说，他却全然记不清了。

令人费解的是，临西县“四·二九”烈士陵园于1987年4月在贺伍庄村北落成，杨宏明烈士的遗照已在纪念馆中供人瞻仰了36年，为何会出现“假照”之说呢？这则“民间传言”关乎英烈肖像的真伪，绝非小事。自此，查寻传言出处、核实遗照真伪，成为我难以放下的心念。

1.

2023年4月5日，我揣着沉沉心事，从烈士陵园返回县城。既然内心笃定“假照”之说大概率为讹传，开展查证就要力避“大张旗鼓”，因为线索一旦盲目扩散，反而可能玷污英烈尊严。

是日夜阑，我伏案桌前，摊开稿纸，从党史办、地名办、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中选取了5位朋友，计划翌日上午致电问询，核实他们是否曾听闻“假照”的相关说法。

“我从没听说过呢！您这消息从何而来？”五通电话里，他们的答复内容或长或短，末了的反问却出奇一致。

放下话筒，虽早有预料，落寞之情依然袭上心头。遗照是英烈牺牲后的“细节”，当被问及这些细节的真伪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分明感到了“问题”的蹊跷与严重。没有其他线索，还继续调查吗？午时和暖的阳光，穿过明净的窗口，泻进室内。我依窗而立，俯瞰着远处街边的垂柳，那葳蕤茂盛的树冠，在春风的拂动下，犹如朦胧飘荡的绿云，驱散了我的浮躁情绪。我想，这事宜缓不宜急。

临西县“四·二九”烈士陵园中的纪念碑

此后，我开始在业余时间查阅有关史料。据《中国共产党临西历史》记载，杨宏明烈士牺牲的“四·二九”反“扫荡”主战场虽在临西西部，但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机关所在地却是与之接壤的邱县。据此推测，烈士陵园的遗照极可能源自邱县，只要查清照片出处，其真伪自会水落石出。

2.

光阴荏苒，时至仲夏。

一个周末上午，阳光普照。我从临西县城驱车西行，不到一小时就驶入邱县。经过提前联系，3位耄耋老人已在办公室等候。

“尽管咱们现在分属邯郸市邱县和邢台市临西，但其实在‘四·二九’反‘扫荡’后，咱都属于宏毅县，是一个县的老乡！”甫一见面，76岁的党史办退休干部老李就用一句话拉近了距离。

宏毅县设立于1942年10月。为纪念在“四·二九”反“扫荡”中牺牲的杨宏明、孙毅民二位先烈，冀南行署在临西、清河、威县交界处划出部分村庄，建立了这个新县，命名为“宏毅县”。

一番寒暄后，我直奔主题，询问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是否曾提供过杨宏明烈士的遗照。“还提供照片？听村里老人回忆，当年杨司令他们在邱县，艰苦得很呢！吃的是杂面掺野菜，很难见到油星子。一双布鞋穿到磨底，打起仗来人人都是铁脚板，那叫一个苦啊！杨司令去敌占区摸敌情、做工作，来无影、去无踪。哪里还会去照相、敢照相？”邱县地方史学家老刘率先开口，予以否定。

“兴许杨司令之前照过，藏在包裹里，他牺牲后，有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呢？”我继续挖掘着可能性。

83岁的老王曾是邱县老区建设促进会成员，年纪最长。他缓步走到我身边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坐下后说道：“我耳朵背，你耐心听我说完，就知道邱县不可能有他的照片。”

老王回忆，杨宏明是在1940年末抗战形势最严峻时来到邱县的。为开辟抗日根据地，他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，攻占日军占领区力量薄弱的据点，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，组建村级民兵武装，对伪军头目开展攻心战，建立统一战线……在后来的宏毅县，老百姓都知道来了个“靠山”，至于“靠山”啥模样、叫什么，却没什么人知道。

邱县人知道“靠山”牺牲，还是在1942年6月。1968年11月，邱县政府修建烈士陵园，许多人都想到了当年的“靠山”，决定在陵园单独为他立碑纪念。可访遍众人，却没人知道他的姓名，而且由于资料奇缺，大家误认为当年宏毅县之“宏毅”二字为“洪义”，就是杨宏明司令的大名，遂在碑体上雕刻了“英雄杨洪义永垂不朽”。

老王说完，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找出一张模糊的照片。照片中，高台上的石碑在松树拱围中高高矗立，顶部的红色五角星似在灼灼发光。尽管照片中仅能看出碑文为黑底白字，字迹模糊不清，但我依然被深深地触动。

“照片出自邱县”的猜想至此以否定告终。但杨宏明在艰难岁月中那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，无私奉献的忠诚品格，却永远镌刻在老百姓心中，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既然邱县没有提供英烈遗照，这张照片会不会来自杨宏明远在湖北的故乡？

几番辗转，我终于联系上了湖北省红安县的相关知情人。

“家人不可能提供照片。杨宏明烈士牺牲60年后，亲人才得到他的消息。临西县1987年建成陵园时，他的家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牺牲，根本不可能提供遗照。退一步讲，家里也不可能有他照片。杨宏明是放牛娃出身，家境苦寒，17岁就离家投身革命，哪里会照相呢。”知情人说。

经进一步询问，我了解到更多英烈早年的往事——

杨宏明七八岁时就给地主放牛。天亮前，他要先给地主打扫庭院，清理牛棚。傍晚放牛归来，地主还要通过查验牛肚看牛是否吃饱。如果牛没有吃饱，他就要被鞭打，晚上也不许吃饭。

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，黄安（今红安县）的一批革命先驱深入各村开展工作。杨宏明的母亲以贩卖油条作掩护，积极从事农民运动，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杨宏明在母亲的影响下，走上革命道路，参加了黄麻起义。起义失败后，17岁的他加入由起义军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，从此离家无返，直至牺牲。

线索再次中断，照片查证陷入僵局……

3.

时光飞逝，转眼又是一年。

2024年2月14日，我从故乡返回县城，英烈遗照之事再次涌上心头。

打开台灯，翻开过往笔录，我试图发现新的查证思路。忽然间灵光闪现——假照之说，会不会源于60年的时空阻隔？也就是说在杨司令牺牲60年后，其亲人来到烈士陵园，发现遗照有“误”，假照之说才由此传出？若是这样，那原先的遗照又来自哪里？

循着这一思路，我决定以“缘何60年后家人方才知晓烈士牺牲”为突破口，继续调查。

此时，我想到了老陈。老陈，2003年6月从临西县委党史办退休。电话询问后，未料到，他竟真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。

杨宏明牺牲后，冀南军区想尽各种办法与其家人联系，未能如愿。后经组织研究，决定将他埋葬在与姚尔庄村毗邻的贺伍庄村烈士墓群。

1950年10月，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在河北省邯郸市落成。组织决定把杨宏明的墓葬从烈士墓群中迁出，再次通过湖北省红安县民政部门与杨宏明的家人联系，依然未果。只好还由组织出面，负责其墓葬迁移。

临西县“四·二九”烈士陵园落成后，杨宏明烈士的资料被纳入纪念馆展陈，陵园还为他铸造了铜质雕像，以纪念这位在“四·二九”反“扫荡”中牺牲的最高指挥官。

杨宏明烈士雕像

我追问道：“为何多次联系未果，直到杨宏明烈士牺牲60年之后呢？”

“关键就在名字上。”老陈回答道。杨宏明是他的乳名（小名），学名（大名）叫杨兴胜。他参加革命后，一直使用乳名。首长、战友都叫他杨宏明，没人知道他的学名。而红安县这边，大家只知道杨兴胜离家投身革命，却不认识“杨宏明”。随着岁月流逝，“杨宏明”这个乳名，更不为家族之外的人所知晓。

“60年后是怎么联系上的？”“严格来说，是59年。2001年4月，杨宏明的妻子张之建、侄儿杨世安等人，第一次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祭扫，这是他牺牲后亲属的首次祭拜。”老陈说道。

杨宏明与张之建于1941年结婚。杨宏明牺牲后，张之建被调到太行山参加整风运动，后与韩振夫结婚，随丈夫入川工作。

不觉间已到中午，我提出请老陈外出就餐，感谢他扎实细致的讲解。“不用不用！其实，这些事也有很多人知道。20多年前，《燕赵都市报》曾刊发过烈士亲属寻找遗属的新闻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杨世安与张之建相认，同去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祭拜，都是报社帮忙牵的线。”

这次会面，为我指明了查证的关键路径：去《燕赵都市报》报社，看看张之建和杨世安59年后的祭拜，是否与“假照”传言有关。

4.

2024年10月，我来到石家庄市裕华区，联系到报社原副总编辑老韩，详细了解当年“寻亲”的相关情况。

2000年7月，报社收到一封来自湖北红安县的信，这是一封烈士亲属寻找烈士遗属的来信，写信人为杨世安。仅用了几天时间，记者便告知杨世安寻亲的结果。

“记者是否跟踪了解后续情况，特别是相关细节？”我急切地问道。

“这是条新闻‘活鱼’，咋能放弃？自然要跟踪采访报道。”老韩说。

杨世安联系上张之建后，相约一起去烈士陵园祭扫。墓茔前，张之建百感交集、热泪盈眶，杨世安、杨世春兄弟两人，从家乡带来了一包红土，流着泪水，一把一把撒到坟茔周围（寓意英魂回归故土），口中念叨着杨宏明父母生前留下的不尽话语……

祭奠后，他们来到烈士纪念堂参观。站在“四·二九”反“扫荡”战役纪念栏前，烈士陵园的常主任介绍说：“杨司令生前没有留下照片，这张画像是根据烈士战友的描述，专门请画师绘制而成的。”他特意向张之建老人征询了对画像的看法，张老戴上眼镜，端详了许久，说：“有点儿像，不太像，胖了。”随后，她指着身旁的杨世春，说：“没有他像。”陵园领导当即决定，依照张老的意见，结合杨世春的样貌，重新绘制烈士画像。

第二天，张老及其亲人又来到临西县“四·二九”烈士陵园，还专程前往姚尔庄村东的麦田，寻访杨宏明烈士当年牺牲的地方。村民们听闻杨司令的亲人来了，纷纷赶来围拢在他们身边，眼噙热泪，述说着当年杨司令为护卫百姓，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战斗场面。张之建老人触景生情，与老区百姓一同追思过往……

至此，“假照”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。

今年6月，湖北日报社记者来到临西，将杨宏明烈士的遗照刊发在报纸上，并撰文写道：英烈精神犹如灯塔，引领着冀南老区人民，努力奋进。

山河日新，英雄不朽。华夏振兴，烈士千秋。那张历经两次绘制的“遗照”虽然并非英烈的真实影像，但它承载的思念与敬意无比真挚；“假照”的传言虽曾引发疑惑，但追寻真相的过程，让英烈的事迹与精神被更多人铭记。这，便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北省临西县人民检察院）

访莫言旧居 寻文学原乡

林甲淳

莫言旧居　　张哲/摄

第23届全国检察文学笔会采风的最后一站，我们一行人来到了莫言旧居。胶州湾的小雨斜斜飘洒，春诺润丰庄园积着浅浅水洼，远处的高粱与树木笼罩在朦胧雾气里，景致曼妙。而在高密胶河岸边，平房土墙之上，莫言的老屋里静静藏着中国文学的“故事眼”。

跨进院门，反扣的大石磨、积着雨水的水缸便先入眼帘，沾着泥渍的土路恍惚间让我们与莫言小时候的脚步重叠。行至屋门口，脚被门槛轻轻绊了一下，低头才发现，硬木门槛中间凹下去一大块，边缘被磨得发亮。“这是莫言兄弟几个磨出来的！”同行的老乡嗓门洪亮，“当年他们放学了就往门槛上坐，书包扔在地上，书摊在膝盖上，一页页翻得入迷。日子久了，木头竟被裤腿、鞋底磨出了坑。”下雨时，坑里积着水，映着屋檐，倒像个小月亮。

天色渐暗，灯光如豆。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窗棂间漏进的微光虽弱，却让人想起少年莫言的夜晚：他曾就着这盏灯在炕上看书，灯油要省着用，常常看到一半就得吹灯，躺在黑暗里还在琢磨书里的情节。木门的吱呀声里，满是岁月的味道。

这座始建于1912年的旧居，曾有五代人在此生活。屋子是典型的“五间房”格局，进门便是灶台；左右两侧的西屋分属父母、祖父母与叔叔婶婶，角落里堆着旧农具；东墙下的土炕最是显眼，席子的边角卷起，露出下面的土坯——这里正是莫言出生的地方。屋顶上的高粱秸秆、土墙里的草木灰，还留着“西二间”的印记，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出生于此。墙皮斑驳如老人的皱纹，墙角剥落出浅浅凹槽，暮色从木窗透过来，铺展开老屋的简陋与厚重。

北头房间里，农耕器械锈迹斑斑；四方桌上躺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，那是当年家里除了手电筒外的第二件“家电”。少年莫言总喜欢凑在哥哥身边蹭书看，被推开了又固执地凑过去，甚至因为看“闲书”忘了割草喂牛，挨过父亲不少责骂。父亲的严格管教改变不了他对书的痴迷，有一次，邻居家的孩子用旧书换他帮忙，他换来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一边推磨一边看书，没扶稳磨杆，“咚”地撞在门框上，额头磕出个包，他却只顾着捡书，连疼都忘了。

西侧的工艺间，曾是莫言爷爷奶奶的住处，后来成了他的婚房。炕边的墙上挂着一面圆镜，红漆“双喜”已褪成淡粉色。当年的婚礼很简单，请几个亲戚，在炕桌上摆两盘花生、一碟糖果，新人对着镜子磕个头，就算把家安在了这里。墙上贴着泛黄的报纸，边角卷起却没脱落，这里，是莫言最早的“文学启蒙地”。当年“抬头见报”的日常，让他在心里悄悄埋下了写作的种子。

老屋的门，似乎总敞着半边，像在等谁回来。土灶旁的锅台还留着余温似的记忆：当年，莫言的母亲就是用这口锅，烧出高密的土菜，招待来拍《红高粱》的张艺谋、姜文、巩俐等人。逼仄的屋里挤着几个人，姜文不小心踢碎了唯一的暖瓶，热水溅在凹陷的门槛上，冒起白气，莫言却笑着说，这预示电影会成为爆款。

如今，老屋的烟囱不再冒烟，却总有人来。有人站在门槛前抚摸那处凹坑，有人坐在土炕上拍照，还有人捧着书在院里轻声朗读。下雨时，雨水顺着屋檐滴在门槛的凹坑里，滴答、滴答，像在数着过往的日子。同行的笔友忽然打趣：“这屋里的蚊子怕都沾了文脉，叮一口怕是能‘灵感打包’！”一句话逗得满屋生笑，把土屋里的湿气都冲淡了。

一场检察文学笔会的寻根之旅，让我们这些检察文学创作者心中满是触动。莫言旧居不只是文学的原乡，更给了我们一份深刻的创作启示：正如这土屋门槛上的凹痕、土炕的温度、石磨的纹路里藏着岁月，检察文学也该紧贴案件里的人和事，紧贴检察官的坚守与百姓的期盼，把高密的风土人情、法治路上的温暖故事，酿成有力量、有温度的文字。让正义与文学的薪火，像胶河的水一样，静静流淌，滋养人心。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）